

中日医学交流的政治史

——以 1950 年代中期的相互访问为中心

饭岛涉

摘要：1957 年的第二次访华医学使节团中，寄生虫学者大鹤正满（新潟大学医学部教授）也在其中。在此期间，中国的毛守白（上海寄生虫病研究所）一行回访了日本。这些相互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学术交流。但是在这个时期，中国根据 1956 年《农业发展纲要》发起了爱国卫生运动，1957 年发起反右运动，正值政治敏感时期。因此，大鹤在发表的访华记录中，虽然整体轮廓不甚详细，但是也传达了一些这个时代的政治情况。这是因为，大鹤留下了众多珍贵的资料，其中包含访华期间的详细日志，另外因为喜欢摄影，他也留下了大量的照片与在访问地区从中方收到的资料等。日志详细记载了大鹤在 1957 年 5 月末到 6 月末参加第 2 次访华医学使节团时，在中国各地将近 1 个月视察时的调查活动、访问机关的概要、以及当时交流的研究学者。也有几处可以看出是和中国学者的笔谈。大鹤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化进程中，卫生状况是否真的发生了巨大变化，宣传的“苍蝇已灭绝”是否是事实。大鹤在访问地以及在途中，屡次抓苍蝇。在国务院接受周恩来总理会见的日志中，提到“周总理面前有一只苍蝇”。还记录了周恩来坦率的发言“这里有一只苍蝇，谁说中国没有苍蝇啊，我来给他找一只看看”。这个小插曲，大鹤提到中国访问时一定会谈到，周恩来坦率的发言给大鹤以及访

* 在这篇文章的翻译上，得到了诸志华女士的大力协力，在此表示感谢。

华团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文不仅介绍大鹤正满留下的日志和照片等资料,也会对1950年代进行的医学与公共卫生专家之间的相互访问的意义进行讨论。

序 言

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之前,两国之间还未有正式的外交,但民间团体已经利用各种途径进行相互访问。在尚未获得联合国合法席位时期,对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来说,可以通过邀请的这些外国工会或文化团体获取很多信息,同时也可以向这些国际人士展示中国革命后发生的巨大变化,获取他们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理解,可以说是广泛意义上“革命外交”的一环。对日本及其他国家的人来说,大家政治立场不同,访华的意义更是不同。但结果是各种身份立场的人有机会拜访中国,才得以留下宝贵的记录。日本虽说和中国尚未建交,但是毕竟有中日战争这段残酷的过去,在这种情况下访问共产党政权下的中国,并介绍当时中国的情况,这具有很大的意义。

本文关注的是1950年代中期日本医学以及公共卫生专家们的三次访华活动。之前的研究多关注于政府间的正式关系以及政党间的关系,或是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民间交流,对于科学和科技方面专家团的相互访问未作太多关注。

- (1)1955年的第一次访华医学使节团,佐佐学(东京大学传染病研究所)等人
- (2)1956年的小官义孝使节团,小官义孝(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等人
- (3)1957年的第二次访华医学使节团,大鹤正满(新泻大学医学部)、晖峻义等(劳动科学研究所)等人

1955年11月,佐佐学(东京大学传染病研究所)作为第一次访华医学使节团的成员访华,期间被周恩来总理询问了日本血吸虫病对策问题¹,第二年也就是1956年,以小宫义孝(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寄生虫部部长)为中心的使节团访华,并对日本血吸虫病的防控提出建议。

小宫使节团的活动较为人知。使节团负责人是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寄生虫部部长小宫义孝,他曾在山梨等地开展日本血吸虫病的防控工作。并且,在小宫的说服下,冈部浩洋(久留米医科大学教授,寄生虫学)、吉住良夫(同大学教授,内科学)、伊藤二郎(预防卫生研究所,寄生虫学)、安罗冈一男(同上)也加入了使节团。久留米医科大学的冈部教授能参加自是因其本身是日本血吸虫病专家(久留米医科大学位于日本血吸虫病流行区域之一的筑后川流域),另外,当时的情况应该是比起国家公务员私立大学人员更易访华。小宫也动员当时身为千叶大学医学部教授的日本血吸虫病专家横川宗雄教授,但未能成行,代为参加的是安罗冈。

小宫一行自1956年9月26日至12月12日期间访问了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无锡、汉口等地。小宫和在德国汉堡热带医学研究所留学时的友人钟惠澜等中国学者一起视察了疫区,并提出具体对策。那是当时在日本山梨县甲府盆地等疫区尝试的对沟渠进行水泥硬化从而扑灭媒介钉螺的主要对策²。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借鉴了小宫建议中的寄生虫对策原理,运用到实际中的是动员农民、学生、解放军等人一起填埋旧水路开辟新水路从而扑灭媒介钉螺的对策³。并且,该对策与人民公社化中发起的爱国卫生运动同时进行,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⁴。

1 佐佐学《随笔集 学究三昧》实业富山社,2003年,第182-183页。该文章第一次出现是在《环境卫生》1956年1月。另外,根据笔者访问得知,佐佐学是受到周恩来接见后,想到应该委托身为日本血吸虫病专家的小宫访华(访问佐佐学,2004年3月6日)。

2 小宫义孝《中共の住血吸虫病防治对策に対する意见书》《日本医事新报》1957年2月9日,第1711号,第45页。

1957年的第二次访华医学使节团中,寄生虫学者大鹤正满(新潟大学医学部教授)也在其中。在此期间,中国的毛守白(上海寄生虫病研究所)一行回访了日本。这些相互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学术交流。但是在这个时期,中国根据1956年《农业发展纲要》发起了爱国卫生运动,1957年发起反右运动,正值政治敏感时期。因此,大鹤在发表的访华记录中,虽然整体轮廓不甚详细,但是也传达了一些这个时代的政治情况。本文的关注点是1957年的第二次访华医学使节团。这是因为,和佐佐以及小宫的访华后只留下杂志上的文章相比,大鹤留下了众多珍贵的资料,其中包含访华期间的详细日志,另外因为喜欢摄影,他也留下了大量的照片与在访问地区从中方收到的资料等。

本文不仅介绍大鹤正满留下的日志和照片等资料,也会对1950年代进行的医学与公共卫生专家之间的相互访问的意义进行讨论。对于大鹤正满作为寄生虫学者的经历,笔者已在《大鹤正满与台北帝国大学——一位寄生虫学者的轨迹》中介绍,其中也包含他访华的经过⁵。另外,该论文已在台湾以汉语译文的方式发表⁶。因为论述的需要,本文的内容和该论文会有一部分重合,但是本文会介绍新的资料,更会加入新的见解。

3 饭岛涉《宫入贝の物語——日本住血吸虫病と近代日本の植民地医学》,田中耕司编《实学としての科学技术》岩波书店,2006年10月。英文版:IIJIMA W. “Farewell to the God of Plague”: Anti-Shistosoma japonicum Campaign in China and Japanese Colonial Medicine”,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66, 2008.

4 IIJIMA, W., “The Patriotic Hygiene Campaign (爱国卫生运动) and Restructuring of Society in China: Historical Meaning of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ublic Health” in 范燕秋编《多元镶嵌与创造转化:台湾公共卫生百年史》台北:远流出版,2011年。

5 饭岛涉《大鹤正满与台北帝国大学——ある寄生虫学者的轨迹》,酒井哲哉、松田利彦编《帝国日本と植民地大学》ゆまに书房,2014年2月。

6 饭岛涉《大鹤正满与台北帝国大学》,范燕秋编《现代医学在台湾——医学与公卫篇》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20年4月,收录。

一,相互访问的政治外交背景

在中日尚未正式建交时期,以民间为主的相互访问与当时的政治以及外交状况密切相连。首先看看日本的情况,1954年12月成立的鸠山一郎内阁计划改善同共产圈的关系,不再对中日交流实施禁止措施,1956年12月成立的石桥湛山内阁虽然很快就结束了,但这个时期开始重视亚洲,推动了中日的交流。这个时期,在1955年10月社会党的右派与左派统一,另外,自由党和民主党也合并为自由民主党,形成了自由民主党和社会党两大党,即“55年体制”。

再大致看下中国的情况,在1954年10月30日,由中国红十字会主席李德全作为团长、廖承志作为副团长的使节团来日,推动了残留日本人的遣返和战犯的处置。中国共产党于1955年3月讨论并通过了《对日政策和对日活动的方针和计划》,确定了以下“以民促官”(以民间交流为基础,促进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方针:扩大中日贸易、解决渔业问题、推动残留日本人以及战犯的遣返工作。其结果是促进中国贸易代表团来日,加强了日本工会和中国总工会的交流。在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从日本到中国的渡航需要签发“私用护照”。根据护照的签发情况,可以了解日本政权的对华动向。

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了亚非会议,中国的周恩来总理和日本的经济企画厅长官高碕达之助进行会谈,1955年11月以日本社会党片山哲为代表的访华团访问中国。1956年的五一劳动节中国也邀请了日本的工会,但是因为公务员前往共产圈违反法律,日本政府没有给全部人员签发“私用护照”,所以参加五一劳动节的人员只有20名。但在1956年11月到12月之间,中国总工会的代表团访问了日本,1957年日本也向中国派遣了工会的访华团。

如上所述,在1950年代中期,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访华团之所以能成行是因为中日双方政府在促进以民间为主的交流,并采取默认的方



(照片1) 大鹤正满教授(2003年12月,那霸,饭岛拍摄)

针。但是在1957年2月岸信介内阁成立,1958年3月缔结的贸易协定(第四次)中强调设置通商代表机构,并包含赋予外交官特权、旅行的自由、悬挂国旗权等内容,引起了台湾中华民国政府的强烈抗议。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1958年5月的长崎国旗事件,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声明政治三原则,并提出“政经不可分”⁷。综上所述,从1955年开始的三次医学、公共卫生领域的访华,实际是在短暂的融冰期实施的。

那么中国政府为何邀请日本医学人员访华,而日本为何选择了佐佐学、小宫义孝、大鹤正满。应邀访问中国的日本学者又是抱着何种目的访问了中国,对当时的中国留下了什么印象?本文不仅介绍大鹤保留的资料,也会探讨1950年代中日医学界相互访问的背景、内容和意义。

二,大鹤正满的资料

1957年访华的新泻大学医学部教授大鹤正满保存了当时的日志。该日志是了解中日医学界相互访问和当时中国情况的贵重资料。笔者在进行该资料的翻刻,同时也在整理大鹤先生拍摄的大量照片等资料,摸索着将这些作为历史资料有效利用⁸。

大鹤正满(1916~2008)出生于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台中),父亲是台湾总督府农业官员。1936年他从台北高等学校考入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台北帝国大学设立于1928年,后来的医学部设置于1936年,大

7 山田阳一《日中劳动组合交流史——60年の轨迹》平原社,2014年8月,第22-36页。

8 饭岛涉等《资料翻刻 大鹤正满访中日志(一九五七年)》(1)~(4),《青山史学》第31号~34号,2013年~2016年。

鹤是第一届学生。第一届学生中,日本人有23名,台湾人14名。后来也有成为大阪市立大学医学部教授的木村英一(1906~1981)、成为台湾大学医学院教授的李镇源(1915~2001)等人。

在校期间,给大鹤带来很深影响的是解剖学的教授金关丈夫(1897~1983)。金关出身于京都大学医学部,任京都大学医学部副教授后,于1934年赴任台湾成为台北医学专门学校的教授,1936年成为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的解剖学教授,担任自然人类学课程⁹。他留下了大量根据日本弥生时代人骨追溯到日本人起源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任九州大学医学部教授等职务。根据笔者访问得知,大鹤曾希望在金关门下成为人类学学者。学生时代,大鹤为了人类学的调查,曾对从台湾各地坟墓挖掘出来的人骨进行研究,其成果刊登在《台湾医学会杂志》上。另外,为了田野调查曾奔赴广州,对水上居民进行生物人类学的调查。作为金关弟子,对现代人类(也称为解剖学上的现代人 *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向冲绳和日本的迁移过程抱有强烈的兴趣,大鹤从琉球大学退休后也在冲绳各地进行调查发掘¹⁰。

战争改变了大鹤的人生。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后,只有极短的一段时间是做教室的助手,之后便成为陆军军医。在当时的日本征兵制度下成年男子均有义务参军。像大鹤这样有大学学历,特别是毕业于医学部的贵重人才,有只经过短时间训练便能就任军官的制度(日语:短期现役制度),大鹤成为了陆军少尉并驻扎广东省。在军医的生涯中,驻扎广州期间从事的疟疾防疫工作是大鹤复员后成为寄生虫学者的契机。

大鹤这代人,大部分医学生都成为了军医。1955年访华的佐佐学(1916~2006)也是这代人之一,他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之后成为海军军医,在海军军医学校进行疟疾媒介蚊子的调查研究工作。其他

9 《大鹤正满与台北帝国大学》,第310-311页。

10 访问大鹤正满,2003年12月24日,2004年4月23日。

还有横川宗雄(1918 ~ 1995,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陆军军医→千叶大学医学部寄生虫学教授)、片峰大助(1915 ~ 1991,长崎医科大学→陆军→长崎大学地方病研究所教授)等人,他们都有军医的经验,复员后走上了传染病和寄生虫学的研究之路,带动了战后日本在该领域的调查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战败前后的营养状态恶化,是“寄生虫天堂”。直到1960年代才终于摆脱这种情况,成功控制了大部分的寄生虫疾病以及地方病¹¹,这是因为大鹤这个时代的医学生们在经历了战争和战场后踏上了寄生虫病和传染疾病的调查研究之路,为战后日本各地的防疫工作贡献了力量¹²。

战败后,复员的大鹤从1948年开始在九州岛饭冢的三井产业医学研究所作为行业医生从事煤矿的钩虫病以及周围农村蛔虫病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九州大学的博士学位。好像九州大学为台北帝国大学毕业的日本学生继续深造提供了很多便利。之后,大鹤于1954年成为新泻大学医学部医学动物学教室的教授。医学动物学(Medical zoology)是研究蚊子等病原体媒介动物的学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各地医学部都新设的讲座。这也是因为在日本各地,地方病以及寄生虫病这类传染病已经给人们的健康和生活带来很大的障碍,有必要进行调查研究。大鹤在新泻时期进行的主要调查研究是新泻等地地方病之一的恙虫病。另外,他也积极参加新泻县等地的寄生虫预防会的活动,为以学校保健为中心的寄生虫疾病防控尽心尽力。之后,大鹤于1978年1月成为琉球大学医学部创设准备室长,1979年10月成为琉球大学新设医学部教授,并成为第一任学部部长¹³。

11 多田功《日本における寄生虫防压とその特质》, *Tropical Medicine and Health*, Vol.36, No.3, Supplement, 2008.

12 饭岛涉《フィラリアの制压と二〇世纪日本の热带医学——从地方病的防控到国际保健》,秋田茂、胁村孝平编《人口と健康の世界史》京都:ミネルヴァ书房,2002年8月。该论文是以长崎大学地方病研究所以及片峰大助等研究学者为中心对淋巴系丝虫这种地方病的防控过程进行的研究。

琉球大学医学部设立的经过以及在冲绳的调查研究活动,比如疟疾媒介蚊的调查研究等也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因为偏离本文的主题,所以不做详细论述¹⁴。从新泻大学到琉球大学的调动是以担任学部长为前提的,这也是当时文部省的意向。在访问中,谈到为何来冲绳时,大鹤表示对出生在台湾的自己来说,冲绳给自己很亲近的感觉,也包括在生活习惯上¹⁵。之后,在琉球大学医学部,大鹤积累了多种多样的研究资料。

整理大鹤资料的感受是,大鹤教授保存所有的资料,比如出席国内外学会时的登机牌和行李托运的标签也没有扔掉。这些资料虽然和本文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在其他领域有可能是贵重的资料。积累的资料数量庞大,退休后也原封不动的被琉球大学医学部寄生虫教室(现称:琉球大学大学院医学研究科寄生虫学·国际保健学讲座)保存了起来。但2008年大鹤去世后,因为讲座被正式整编,资料有可能被废弃。

日本的大学制度是讲座一旦整编,积累的资料多被废弃。寄生虫学和医学动物学的讲座随着疾病构造的变化与研究方式及内容的变化,很多已经关闭。比如,最先开设寄生虫学讲座的庆应义塾大学医院部和有悠久历史的京都府立大学医学部的寄生虫学讲座都被整编¹⁶。保存在



(照片2) 整理之前的保存于旧寄生虫教室的大鹤资料

13 参照《大鹤正满と台北帝国大学》,第328-330页。

14 参照《大鹤正满と台北帝国大学》,第330-331页。

15 访问大鹤正满,2003年12月24日,2004年4月23日。

16 京都府立大学医学部寄生虫学教室的资料中,小林晴治郎教授(曾担任京城帝国大学医学部教授,战败后成为京都府立大学教授)以及其学生吉田幸雄教授的部分研究资料和大鹤资料在同时整理,现寄存于目黑寄生虫馆。另外,庆应义塾大学医学部寄生虫教室的资料(宫岛干之助、小泉丹、松林久吉、浅见敬三、竹内勤等人的资料),在该教室的协助下已经开始了整理工作。

琉球大学医学部的大鹤资料,在大鹤的弟子们,即当时的佐藤良也教授、当真弘准教授,讲座的野中大辅博士、藏下一枝女士等人,以及青山学院大学博士生和硕士生们的协助下,终于掌握了大鹤资料的整体构造,并对其进行整理和保存。

大鹤资料极其多样,其内容如下。

(1) 新泻大学与琉球大学医学部时期的研究资料

这部分主要是以寄生虫对策资料为主,是以军队生涯中的疟疾研究为基础的研究。这也是记录战后日本寄生虫学会和卫生动物学会发展轨迹的重要资料。同时也有大量的研究笔记(手稿)。

(2) 国外出差时的调查资料

这部分是大鹤在新泻大学和琉球大学医学部担任教授期间,访问中国、台湾、东南亚、欧美、苏联等国家时的资料。1957年的“中国访问日志”就是其中一部。还有很多是和国外学者交流的记录与信件。大鹤在1962年以后频繁访问台湾。大鹤资料也包含台北帝国大学时期恩师杜聪明(台北帝国大学唯一的台湾人教授)的文书¹⁷、书信,以及体现和同学后辈关系的资料。另外还有大鹤与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同窗会东宁会亲密往来的大量书信。

(3) 设立琉球大学医学部的相关资料

1979年,在琉球大学保健学部的基础上新设了医学部。大鹤为担任第一任学部长从新泻大学来到琉球大学。大鹤调动的背景已经介绍过,是因为他对台湾的感情(冲绳离台湾很近),他出生于台湾,在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学习后才成为寄生虫学和热带医学的学

17 关于杜聪明,可以参照井上弘树的《台湾の科学者と「光复」——杜聪明による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の运营を事例に》,《东洋学报》93(4),2012年3月。

者。另外,大鹤曾设想把琉球大学医学部作为热带医学和寄生虫学调查研究的据点,展开国际保健领域的研究。大鹤保存了当时和文部省往来的文书,这些都成为大学历史的重要资料。该资料已经移交于琉球大学。



(照片3) 标本,应该是1957年访华期间收到的。

(4) 标本

除文字资料之外,还保存有很多标本。很多是传播疟疾的按蚊。有大鹤自己采集的,也有受赠的(含1957年访华时,中国研究学者赠送的部分)。这些在二瓶直子博士的协助下,已移交于国立传染病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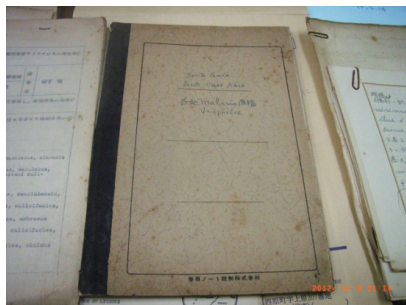
在整理资料之际,这种标本类资料的处理十分让人头疼。对纸类资料的整理虽有一些经验,对于标本的价值以及处理方法却完全是外行。但是在整理的过程中也有所耳闻,近年来已经开始无法把标本带出国外或是带进来。土壤作为研究资料之一,出入境都需要检疫和繁琐的手续,事实上不可能。某种意义上,大鹤资料中包含在日本已经灭绝的蚊子标本,这是十分珍贵的资料。

(5) 照片资料

大鹤留下了大量的照片资料。多是在台湾和东南亚等国家进行调查时拍摄的,因用于教学和研究而保存了下来。大鹤很喜欢相机,拍摄了大量照片,其中就有1957年访华时拍摄的照片,虽然大量底片被保存下来,但是很多已经劣化,困难保存。

(6) 幻灯片(以寄生虫为主)

幻灯片主要用于教学。已把1000多件进行了扫描,现由琉球大学医学部的相关讲座进行保管。



(照片4) 森下薰的研究笔记,内容是太平洋战争期间在新几内亚岛等地对疟疾媒介蚊的调查研究。

(7) 图书资料

图书资料包含寄生虫学、热带医学相关的专门书籍以及大量研究用的“抽印”本。受赠文献也很多,语种繁多,多数是和台湾有关的书籍。比如有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同窗会名单等贵重资料。

(8) 森下熏相关资料

和大鹤资料同样重要的还有大鹤保存的森下熏的资料。森下

熏(1896~1978)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动物学科毕业后,先后供职于北里研究所、台湾总督府中央研究所卫生部、后成为台北帝国大学热带医学研究所的教授,进行台湾疟疾媒介按蚊的研究。战后,成为大阪大学微生物病研究所教授,为日本热带医学会的创立作出努力。太平洋战争中,森下受海军委托在新几内亚岛等岛屿对疟疾进行了研究。当时的研究手稿由大鹤保存了下来。森下资料是展示日本热带医学发展轨迹的重要资料之一。在森下从大阪大学微生物病研究所退休时,大鹤接手了一部分藏书,琉球大学医学部图书馆中有森下文库,日语书籍约1300册,西洋书籍约900册(含杂志)。

上述资料中,和台湾学术界的交流资料以及书信、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同窗会相关的资料、大鹤对台湾寄生虫疾病防疫提出的建议等资料,已经移交于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档案馆。移交工作得到了台湾史研究所的大力协助。资料整理也在王丽蕉主任(当时)的带领下,得到众多工作人员的协助,高效地完成了资料的清洁、保全、目录化工作。现在这些资料已经开始公开。大鹤资料因是私人文书,未在网络进行公开,但公开了资料的目录,可以通过目录了解内容后,再到馆内阅览¹⁸。



(左;照片 5)台湾史研究所保存的大鹤资料。为妥善保存,保管在有温度管理的书库里,并整齐地放入中性纸箱中。(右;照片 6)根据阅览要求从书库取出的大鹤资料,但该图片是大鹤资料中大鹤保管的森下薰的资料。因介绍大鹤资料的整理状况需要,以上图片拍摄均得到了特别许可(2014 年 10 月 20 日,饭岛拍摄)。

其他的大鹤的资料,已委托目黑寄生虫馆进行保存、公开。另外,移交目黑寄生虫馆的寄生虫类资料有 30 多个中性纸箱。这些都在公益财团法人目黑寄生虫馆(龟谷绿理事长、龟谷誓一事务长)的大力支持,以及小川和夫馆长、严城隆研究员等人的协助下才得以实现。现在目录化工作基本已经结束。

目黑寄生虫馆也像整理保存大鹤资料一样,整理和保存了 1955 年访华并对日本血吸虫病对策提出建议的小宫义孝的研究资料。小宫义孝(1900 ~ 1976)在 1956 年访华,并对日本血吸虫病提出建议。小宫出生于埼玉县,从熊谷中学毕业后,经第一高等学校升入东京帝大。在校期间参加社区改良运动与新人会,并组建了社会医学研究会,参加了左翼运动。小宫在 1929 年加入日本共产党,次年被举报后,被撤销东京帝大助手职务,从 1930 年开始在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进行日本血吸虫病等寄生虫和传染病的调查研究。战后,任前桥医科大学(现:群馬大学医学部)教授后,成为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寄生虫部部长,曾参与山梨县等地的日本血吸虫病的防疫工作。1956 年访华时,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防

18 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档案馆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browsingLevel1.jsp?xmlId=0000284803>。



(照片7) 移交目黑寄生虫馆后的大鹤资料,使用中性纸箱进行保存。



(照片8) 国立感染症研究所仓库里保存的小宫义孝的资料



(照片9) 移交目黑寄生虫馆保存的小宫资料

控日本血吸虫病的建议¹⁹。

为了公开、整理、保存大鹤、小宫的以传染病和地方病防控为主的疫学资料,我们作为自愿组织(Voluntary association)设立了“传染病档案室”(代表是饭岛,副代表是市川智生(冲绳国际大学),事务局长是井上弘树(东京医科大学),同时得到了青山学院大学博士生

和硕士生们的协助,与目黑寄生虫馆以及长崎大学热带医学研究所热带医学博物馆、日本热带医学会以及日本寄生虫学会合作,一起对资料进行整理、保存、公开²⁰。

19 前述,饭岛涉《宫入贝の物語——日本住血吸虫病と近代日本の植民地医学》。

20 饭岛涉《“历史疫学”の世界——日本におけるマラリア,日本住血吸虫病,フィラリアの制圧とその経験の歴史化》,《医学のあゆみ》No. 258, 2016年7月23日(北洁編集《グローバル感染症最前线——NTDsの先へ》別冊·医学のあゆみ,2017年5月再編)。饭岛涉《历史疫学(historical epidemiology)という課題——風土病の資料を「つくる」》,《历史学研究》第994号,2020年3月,亦可参照“传染病档案室”的网页:<https://aidh.jp>。

三,“大鹤正满的访华日志(1957年)”

大鹤资料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大鹤正满访华日志(1957年)”这部分。日志详细记载了大鹤在1957年5月末到6月末参加第2次访华医学使节团时,在中国各地将近1个月视察时的调查活动、访问机关的概要、以及当时交流的研究学者。也有几处可以看出是和中国的笔谈。

访华团成员除大鹤外,还有以下人员:堂森芳夫(1903~1977,金泽医科大学毕业,自己开诊所后成为社会党议员)、八田善之进(1882~1964,东京帝大医学部毕业,任社会保险中央病院院长、内科)、久慈直太郎(1881~1968,东京帝大医学部毕业,曾任京城医专教授,后担任日本



(照片10) 访华团成员。第一列左一是久慈,左三是堂森。第二排中间戴眼镜的是晖峻,旁边系领带的是八田。大鹤在第四排中间。

红十字病院院长、东京女子医科大学校长、妇产科)、晖峻义等(1889 ~ 1996, 劳动科学研究所, 产业卫生)、森重静夫(都立驹込病院院长, 东京大学讲师, 小儿科)、柳泽利喜雄(千叶大学医学部教授, 公共卫生)、铃木武德(新宿红十字产院院长, 妇产科)、今牧喜雄(社会保险葛饰病院院长, 内科)、长桥千代(日本红十字病院医生, 妇产科)、斋藤一(劳动科学研究所主任研究员, 产业卫生)、石滨淳美(岩手医科大学副教授, 妇产科)、生垣贤(日本血液银行技术部部长, 血清学)、寺内隆吾(堂森秘书)、小川卓(日本学术出版社)。

这次访华团是中国对日本的回礼。因为在前年 1956 年东京召开的第一届亚洲产业保健会议上, 日本除邀请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菲律宾之外, 也邀请了中国。负责此次会议运营的是劳动科学研究所的晖峻义等, 晖峻任事务局长。当时能从尚未建交的中国邀请学者, 社会党党员的堂森芳夫发挥了其政治力量。

大鹤访问中国是 1957 年, 正赶上中国政治季节。同年 2 月末,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 掀起“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运动。该运动逐渐发展成对共产党的批判, 毛泽东在 5 月中旬提出扫清党内修正主义。6 月初, 《光明日报》主编储安平批判共产党一党天下, 毛泽东感觉到中国有可能爆发匈牙利事件, 指示在党内展开反右派斗争,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批判“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过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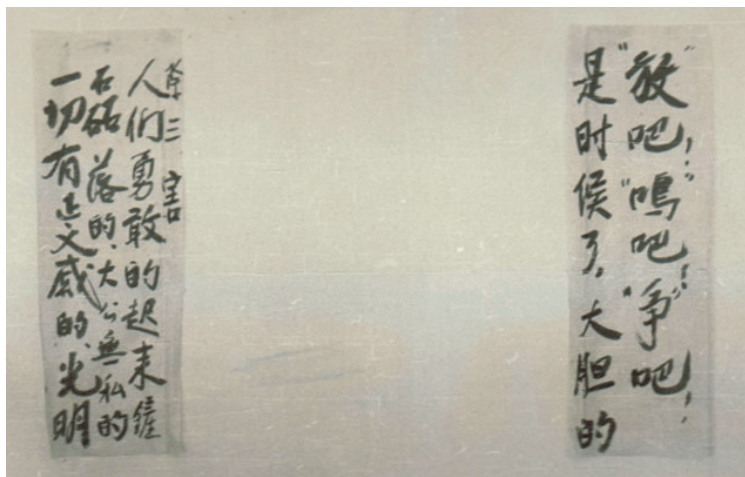
这个时期, 浅沼稻次郎为团长的日本社会党第 1 次访华亲善使节团在 1957 年 4 月访问了中国, 毛泽东会见了浅沼。同年 5 月中旬, 岸信介首相访问东南亚六国, 归途中访问了台湾, 和国民党的蒋介石总统会谈, 对国民党的大陆反攻表示理解。

这个时期的中国, 在医疗和公共卫生事业方面, 引进了苏联医学和苏联模式的医生、护士培养制度。但是, 因医生和护士的严重不足, 作为补充也把中医也加入了医疗体系。另外, 作为政治运动的一环动员大众

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

访华团于 1957 年 5 月 22 日在东京集合,在外务省渡航课办理手续后,23 日晚(正确来讲已是 24 日)从羽田出发,经台北进入香港。一行于 26 日经九龙半岛的罗湖进入中国领域的深圳。之后,访问了广州、武昌、北京、天津、上海、杭州、武汉。将近一个月的视察中,虽偶尔被安排观看戏剧,但是这种活动很少。一行的主要精力用于访问相关机关,加深交流。中方制定的行程十分紧迫,精确到分。

大鹤在视察的时候常常把爱用的徕卡相机挂在脖子上,1957 年访华时拍摄了大量的照片。比如,这应该是从经由香港进入广州时拍摄的照片,大概是注意到摆摊的女性小贩戴着口罩所以拍了照片。访问团的成员们对学术方面的兴趣因人而异,而大鹤最关心的是卫生情况以及当时宣传的蚊蝇已经灭绝是否是真的,因此才有这么多抓拍的照片。关注水上居民是因为大鹤在学生时代就对生物人类学感兴趣,并为此前往广州进行过调查。



(照片 11) 大鹤拍摄的海报(广州)

从政治意义上看,访华团活动的高潮是在国务院拜访周恩来和李德全。中方分别安排了6月6日下午与周恩来和6月7日与李德全的会见。毛泽东发出反右派斗争的指示是6月8日,正值政治微妙时期。



(照片 12) 从香港到广州的沿途上戴着口罩摆摊的小贩。应该是注意到他们讲究卫生所以拍了照片。



(照片 13) 广州的水上居民

访华团中立场比较微妙的是晖峻义等(1889 ~ 1996)。晖峻与国崎定洞以及小宫义孝等社会主义运动的学者不同,是组织劳动科学研究所的社会医学的中心人物,并参加大政翼赞会,在伪满洲国创设了劳动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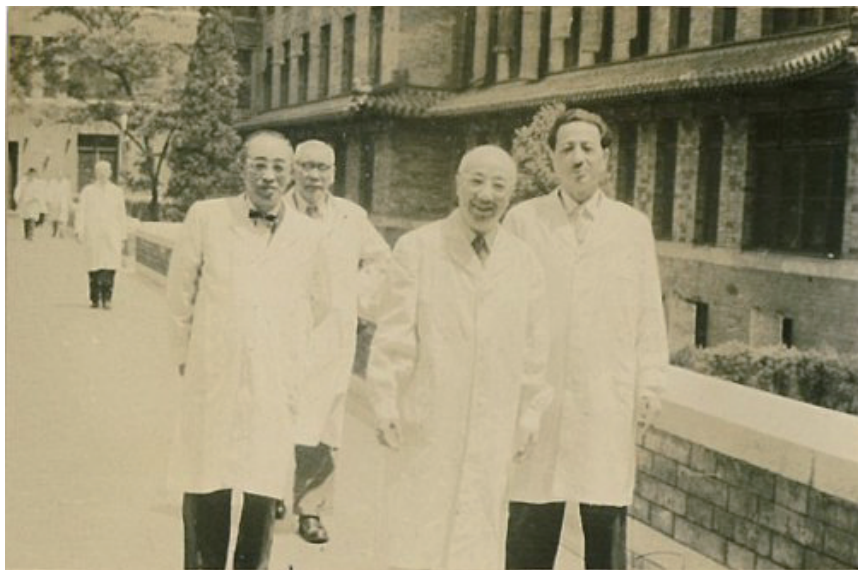
(照片 14) 与周恩来、李德全的会见(北京)



(照片 15) 晖峻义等(中间)

的《晖峻义等博士与劳动科学》中刊登的照片上,晖峻义等坐在离周恩来很远的地方,并且是看向别处的。可以说晖峻当时的样子多少有些奇怪,可能是在访问期间有不合心意的事情²²。

访华团和很多中国医学以及公共卫生界的专家进行了会谈,另外,张铁民(中华医学会)、潘福堂(沈阳医学会)、张颖悟(大连医学院)、金宝善(北京医学院)等从国民政府时期就开始参与医疗与公共卫生行政的人员也参加了会谈。金宝善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曾到日本留学,毕业于千叶医科大学,之后成为国立北京医科大学的教授。还有很多曾到



(照片 17) 北京协和医学院

22 晖峻义等博士追忆出版刊行会《晖峻义等博士与劳动科学》劳动科学研究所,1967年。晖峻论及1957年访华的文章只有晖峻义等的《中国大陆印象种种》(《劳动科学》第4卷4/5号,1957年)与《中国之旅》(《健社建通信》健康社会建设协会,第29号,1957年),并且基本都是只到香港的记录。



(照片 18) 金宝善

日本留学的学者。他们从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到大文化大革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苦难。

大鹤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化进程中,卫生状况是否真的发生了巨大变化,宣传的“苍蝇已灭绝”是否是事实。大鹤在访问地以及在途中,屡次抓苍蝇。在国务院接受周恩来总理会见的日志中,提到“周总理面前有一只苍蝇”。还记录了周恩来坦率的发言“这里有一只苍蝇,谁说中国没有苍蝇啊,我来给他找一只看看”。这个小插曲,大鹤提到中国访问时一定会谈到²³,周恩来坦

率的发言给大鹤以及访华团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周恩来会谈的主题是中国人口的增加,特别提到担心汉族人口增加会造成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摩擦、以及控制人口增长的具体办法等。这时,积极发言的是晖峻义等。与大鹤、晖峻一起访问了中国的石滨淳美把这次对访华的印象写成了文章。石滨在北京与曾留日的医生进行交流时,听中国学者提到当时中国医学界的主流是英美留学派,日本留学派和德国派属于少数派的事情,并将此事记录下来²⁴。大鹤从寄生虫学者立场出发结合军队时期对中国的经验观察了当时的中国,石滨也根据自身经验对中国进行

23 大鹤正满《新中国之旅》,《生活和环境》(财)日本环境卫生协会,第2卷第9号,1957年;《中共的地区组织活动——从蚊蝇扑灭运动来观察》,《公共卫生》第22卷第11号,1958年;《中共のマラリア事情——医学界·寄生虫等》,《日本医事新报》第1770号,1958年。

24 石滨淳美《中共无钱旅行记》,《九大医报》第27卷第6号,1957年,第8页。

了观察。石滨的专业是妇产科,对与周恩来的会谈印象深刻。并且提到“像消灭苍蝇这种公共卫生思想都能贯彻彻底并普及的中国,相信不久的将来在避孕问题上一定能取得巨大成果”²⁵。

大鹤对访华的印象做了如下总结:中国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指示开始重视卫生政策,为了根绝日本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钩虫病、黑热病、日本脑炎、鼠疫、疟疾、天花、性病等疾病,对医疗卫生人员进行培养和动员,并进行除四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运动。同时,大鹤也介绍了上海寄生虫病研究所和海南岛疟疾研究所等机关的研究。世界各地疟疾防疫对策的重点是重视蚊虫多过原虫,而中国的是采取双管齐下的方法,大量生产 DDT,并进行了喷雾残留的实验。另一方面,也因为原虫对 DDT 的抗药性不断增强,作为卫生害虫对策的大众动员在防御疟疾中取得成效²⁶。另外,大鹤也提到“对疟疾使用 DDT 残留喷雾的批判声很高,开始探索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准备推广的方法当时还在研究机关和防疫站进行野外实验”。“实施动员大众依靠人手的环境驱除法,取代杀虫剂并贯彻落实随见随打的方法。另外可以看得出来这些方法一般统一实施,民众没有表达个人见解的余地”。在卫生行政部门建立了垂直行政组织,从居民委员会——卫生小组——各家各户,大鹤提到“该运动以强有力的全国组织形式展开,正好与我国在战前和战争中的卫生组合活动相似,但是更加强大,可以说是上传下达的行政系统中的运动”²⁷。

25 石滨淳美《中共における家庭计划》,《日本医事新报》第 1740 号,1957 年。

26 前述,大鹤正满《中共の地区组织活动——从蚊蝇扑灭运动来观察》,第 41-43 页。

27 前述,大鹤正满《中共のマラリア事情——医学界·寄生虫等》,《日本医事新报》第 1770 号,1958 年,第 14-16 页。

结 语

即便把范围限定在 20 世纪,关于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也很多。在 20 世纪上半叶日本对于中国内陆的介入涉及到了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文化的所有领域,也波及到以个人身份生活在中国所有阶层的日本人。随着日本战败,形势完全改变,这些人一部分成为残留日本人,一部分被留用,在 1970 年代建交之前,是由工会与文化等团体发挥巨大作用担负着民间交流。中日两国相互意识着对方的存在,对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来说,在还未被联合国承认的时期,邀请含日本在内的国外民间人士来中国,加深他们对中国的理解和关心也是重要的外交政策。另外,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是不可忽视的存在,特别是对于工会这些组织来说,已经强烈认识到加深同中国的关系与进行人员的交流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本文介绍的医学与公共卫生专家们的访华是 1950 年代中期,正好是中日两国政府采取不干涉民间交流政策的几年融冰期,这才得使得交流以实现²⁸。

即便是民间交流,医学与公共卫生领域的访华团成员也是形形色色,大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其中小宫义孝访华的意义十分重大,对中国的寄生虫和日本血吸虫病防疫对策发挥了重大作用。参加第二年访华团的大鹤正满留下了很多的珍贵资料,这些资料介绍了当时中国以及中日关系的方方面面。但是,因为中国内部的政治斗争以及中日关系的恶化,之后医学与公共卫生的访华团暂时停止了。日本寄生虫学会的

28 马场公彦《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の形成と变化——1945～92年》,波多野澄雄、中村元哉编《日中の「战后」とは何であったか——战后处理,友好と离反,历史の记忆》中央公论新社,2020年10月,第97-99页。同书还收录了中日双方研究学者的论文,非常有利于了解最新的研究动向。但是,研究对象偏向于以往的政治、经济、文化,本文探讨的医学与公共卫生专家提出的问题是这个领域以后的课题。比如农林水产业与工业等行业间的技术交流也是一个课题。这曾在中国作为“红”与“专”的问题被提出。

成员再次访华已是 1982 年的事了。

比较文学学者张竞在《日本经济新闻》连载了《诗文往还——作家和中国》，同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诗文往还——战后作家的中国体验》（日本新闻出版社，2014 年），并整理了武田泰淳（1912～76）、堀田善卫（1918～98）、高桥和巳（1931～71）、火野葦平（1907～60）等人的访华记录。这些作家对中国的看法因是否有战争战场体验而不同，张竞的这些介绍寓意深刻。火野是有着中国大陆战争与战场丰富体验的军旅作家。1955 年访华时，火野对苍蝇已灭绝的传闻一直持怀疑态度。张竞也引用火野的文章，指出不是没有了苍蝇，而是看到苍蝇立刻拍死了。并且，火野亲身感受到一些变化，提到“对为维护某种强权而存在的制裁表示质疑”²⁹。

火野的理解与大鹤正满有相通之处。本文开始准备是在 2020 年，正好是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病席卷全球之时。我们现在是“历史上第一次，一起同生共死，面对同样的危机”。传染病的流行在 21 世纪的历史要追溯到 2002 年到 2003 年的 SARS 大流行。回头看在 2002 年到 2003 年的 SARS 流行时，笔者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SARS 的冲击——传染病与中国社会》（《现代思想》第 31 卷第 9 号，2003 年 7 月）。另一篇是《SARS 与中国社会》（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 32 号，2003 年 7 月）。前者是日语，后者是汉语。不曾想在 2020 年的传染病全球大流行中，笔者再次收到《现在思想》杂志的邀稿，发表了日语文章《传染病与文明，关于它的中国文脉》（《现代思想》48-7，2020 年 5 月），与汉语文章《作为历史教训的邮轮检疫》（《开放时代》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开放时代杂志社，2020 年第 3 期）。

将近二十年来，接连在相同或是性质相近杂志上发表传染病文章，令我感慨颇深，感受颇多。实际上，在这次传染病的防疫工作中，中国意

29 张竞《诗文往还——作家和中国》，《日本经济新闻》2013 年 11 月 10 日。

识到历史上开展过的爱国卫生运动,所以在武汉即将解封之前的4月2日,中国 CCTV 播放了日本血吸虫病对策的推移与回顾 1950 年代到 60 年代的大众动员型的卫生行政节目。在此前后,3月30日播放了纪念鼠疫防疫对策的中心人物伍连德的节目,31日是天花对策,4月1日是疟疾对策,并且4月3日播放了脊髓灰质炎对策的专题节目。在这次的全球大流行的防疫工作告一段落之时,播放学习历史的节目,并且日本吸血虫病对策也在其中,让人十分感慨。



(照片 19) 2020 年 4 月 2 日播放的 CCTV 专题节目

在这种情况下,笔者改写本文时想起以下事情:21 世纪初的 SARS 大流行中,中国的历史学友人指出虽然当时的中国社会已经不能组织起来有效的防疫动员关系网,但 SARS 的流行也给中国政府和基层社会提供了一个思考该如何相互构建合理关系的契机。事实上,在 SARS 后,

中国政府以取代人民公社和国营企业成为医疗保险单位的“社区”为单位,对医疗和卫生行政进行了重新整编。“社区”在这次全球大流行中作为居民组织为落实封锁发挥了重要作用³⁰。1950年代,大鹤认为在中国为了落实卫生行政与传染病对策的居民委员会是类似于日本卫生组合的强化版组织,但 SARS 以后,是整编的“社区”在这次传染病对策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这次的传染病防控对策中,中国和日本、或是中国和世界的医学与公共卫生界的专家们通过专门的杂志(自然是电子版)共享病毒基因信息以及各种研究情报。但是,中日日本血吸虫防疫对策的经验告诉我们传染病对策仅靠基因信息还远远不够。

现在的我们是否能和中国学者一起把握传染病防疫对策的实际情况?笔者如此感慨,是因为从本文介绍的大鹤资料、特别是通过 1957 年的日志感受到即便是战争结束后不久,中日双方的研究学者也在传染病和寄生虫的研究领域有共通的“语言”。反而是在信息发达的今天,我很怀疑我们是否还有这种共通的“语言”。

日中医学交流の政治史——1950年代半ばの相互訪問を中心に

要旨：1957年の訪中医学使節団（第2次）には、当時、新潟大学医学部教授で寄生虫学者の大鶴正満が参加していた。この前後には、上海寄生虫病研究所の毛守白教授が日本を訪問している。相互訪問の目的は学

30 飯島渉《「疫病史観」による中国の一〇〇年と新型肺炎》,《中央公論》2020年6月号。飯島渉《中国「抑制」から「感染症外交」へ——歴史的視座から読み解く》,《外交》61号,2020年5月。

術交流だったが、この時期は、中国共産党が反右派闘争などを開始した時期にあたっていて、大鶴が残した資料の中にはその様子をうかがわせるものが多い。本文は、大鶴教授が残した日記の内容を紹介しながら、学术交流の歴史的意味を論じる。大鶴の関心の一つは、中国の衛生事情の変化で、当時盛んに喧伝された「中国にはハエがいなくなった」というのは事実かどうかということにあった。訪中の過程で、大鶴たちは、国務院に周恩来総理などを訪ねた。周はその時、「ここにもハエが一匹いるではないか」と述べ、その率直な様子は大鶴に深い印象をあたえることになった。こうした記録を日記にもとづき紹介するとともに、大鶴資料の整理の内容を紹介した。

A Political History on the Medical Mission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in the mid-1950s

Abstract: A medical mission (2nd) of Japanese medical doctors and scientists made a research trip to China in 1957. M. Ohtsuru, a parasitologist and professor at the Medical School, Niigata University, joined the 2nd mission. During the research trip, he was concerned about the changes in the medical and public health sectors in China following the 1949 Revolution. In this article, the Ohtsuru Journal, rich records of his visits for a month to southern and northern cities as well as several agricultural regions, are exam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cademic circles in Japan and China. Prof. Ohtsuru had a chance to meet with PM Zhou Enlai and asked him about the changes in the sanitary conditions. Zhou frankly answered that he

had found a fly in that meeting room, which was considered unsanitary at the time. This kind of talk gave a very good impression to the members of the Japanese side, including Prof. Ohtsuru. Additionally, Prof. Ohtsuru took a lot of pictures and exchanged academic views on schistosomiasis, malaria, and other parasitic diseases with Chinese scholars. These materials compiled by Prof. Ohtsuru are also briefly introduced in this article.